

宋艳萍 著

公羊学与汉代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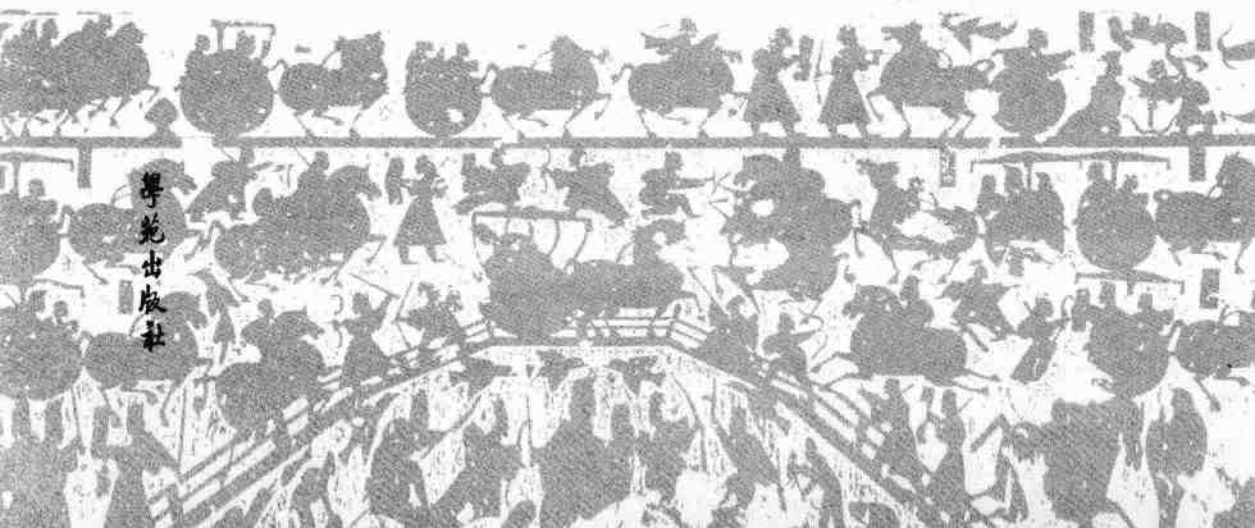


學苑出版社

公羊学与汉代社会

宋艳萍 著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羊学与汉代社会 / 宋艳萍著.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5077-3686-1

I. ①公… II. ①宋… III. ①公羊传-研究-中国-汉代②中国-古代史-研究-汉代 IV. ①K225.04②K23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9851 号

责任编辑: 陈俊

责任校对: 袁大威

排 版: 北京明德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封面设计: 九如轩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67675512、67678944、67601101(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

开本尺寸: 170×235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260 千字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绪 论

《公羊传》是解释《春秋》的一部书籍，它和《左传》、《谷梁传》并称《春秋》三传。公羊学是西汉前期形成的学术思想体系，它以《公羊传》为依托，又在许多理论上大大超越了《公羊传》。据《史记》记载，《公羊传》始于战国时期的齐人公羊高。公羊高相传是孔子弟子子夏的门徒，可能子夏在魏国讲学西河时公羊高曾跟随他学习过《春秋》，公羊高又对《春秋》义理进行发挥，加入大量齐学的东西，从而形成了《公羊传》。后经口耳流传，到西汉景帝时由他的后代公羊寿及弟子胡毋生记于竹帛之上，这就是后世看到的《公羊传》。

公羊学是在董仲舒时形成的，可以说，董仲舒确立了公羊学的学术思想体系。当公羊寿和胡毋生著《公羊传》于竹帛时，董仲舒则抛开了《公羊传》，直接对其理论进行阐发和论证，在理论方面大大超越《公羊传》。许多学者认为董仲舒和胡毋生都受教于公羊寿，我认为有此可能性，但因文献不足，我们不敢断言。胡毋生只忠实地记载了《公羊传》一书，而董仲舒则从理论上对《公羊传》进行了拓展。胡毋生的弟子中最出名者是公孙弘，公孙弘之后再也没有著名的弟子出现。而董仲舒的弟子著名者则很多，而且世世相传，整个汉代都流传不辍，所以说董仲舒对公羊学的建立具有开山之功。

公羊学有着独特的家法，它一直坚持着一种内在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其他学说所没有的。这种精神表现在许多方面。公羊学非常注重气节，邹恽、陈重等都是注重气节的典范。公羊学有着自己对事物的评价标准，它虽然也非常尊重约定成俗的礼制，但并不盲目信仰。对于它认为好的事情会真心赞美，不管是否违背了礼制。对于它认为不对的事情，会尖锐地批判，不管是否违背统治者的心愿。从董仲舒“三统说”、“质文说”，到何休的“三世说”，公羊家充分阐释自己的政治史观，提出对历史和政治的独特看法。公羊学的“三世说”，把人类历史归结为三个发展阶段，并提出了对太平世的美好向往，这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公羊学一直把天人关系作为研究的重要课题，天人合一、天人感应都是公羊学的重要思想内容。

公羊学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几经沉浮。汉代是公羊学的兴盛时期，从魏晋到隋唐，是公羊学的沉寂时期，到宋代，《春秋》学的研究又成为热门话题，胡安国的《春秋学》是宋代《春秋》学研究的典范。我们不能说胡安国的《春秋》学就是公羊学，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与公羊学相同。虽然胡安国的《春秋》学在宋代及明代受到重视，但此时公羊学的研究却没有兴起高潮。从清代中期起，由庄存与发端，对公羊学的研究又开始兴盛，到康有为时到达了顶峰。但随着维新变法的失败，公羊学又一次沉寂下去。从清末以来，公羊学几成绝学。虽然公羊学的研究不再受人重视，但还是有学者进行着这一工作。近代的崔适、刘师培等，老一代的学者周予同、杨向奎、钱穆等，都是研究公羊学卓有成效的学术大师。现在又涌现出一批学者，年长者主要有刘家和、陈其泰、汤志钧等，年轻者主要有蒋庆、黄朴民、陈苏镇等。公羊学的著作也大量问世，专门以公羊学为名的著作有蒋庆的《公羊学引论》和陈其泰的《清代公羊学》，其他在专著中论及公羊学的就更多了。近些年来，研究公羊学的论文也不少，主要有浦伟忠的《何休与〈公羊〉学三世递进的历史进化观》（《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1期）、孙开泰的《试论〈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刘家和的《论汉代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2期）、陈其泰的《论何休对儒学发展的贡献》（《东岳论丛》1995年第6期）等等。在海外，公羊学也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其中日本学者比较关注于这方面的研究。出版的专著主要有日原利国的《春秋公羊传的研究》、稻叶一郎的《春秋公羊学的历史哲学——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的立场》、滨久雄的《公羊学的成立及其展开》等。以上这些著作及文章都为公羊学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为笔者撰写本书提供了有益借鉴。

本书是从两个角度切入并逐步展开的：一个为公羊学在汉代的发展脉络，另一个则是公羊学对汉代社会的影响。本书不仅重视对公羊大家董仲舒、何休思想内涵的揭示，而且把西汉中后期及整个东汉时期公羊学发展的特点加以阐释。笔者认为，学术对社会影响应该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对政治的影响，而且对文化、社会风气、民族关系、法律等都会产生深刻影响，所以致力于对公羊学与汉代社会之关系的探索非常有意义。

目 录

绪 论	1
-----------	---

上编 公羊学学术精论

第一章 《春秋》三传及其区别	3
第一节 《春秋》是一部政治哲理书	4
第二节 《春秋》三传的主要区别	5
第二章 公羊学的基本思想内涵	13
第三章 西汉公羊学	60
第一节 董仲舒对公羊学的创立和发展	60
第二节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格局与公羊学的独尊	75
第三节 西汉中期的公羊学	84
第四节 西汉后期的公羊学	89
第四章 东汉公羊学	101
第一节 东汉前期的公羊学	101
第二节 公羊学的衰落与异化	114
第三节 何休对公羊学的发展	124

下编 公羊学与汉代社会研究

第一章 公羊学与汉代学术	135
第一节 汉代的经今、古文之争	135
第二节 公羊学与谶纬神学	156

第三节	《盐铁论》与公羊学	160
第四节	《白虎通义》与公羊学	171
第二章	公羊学与汉代政治	185
第一节	公羊学对汉武政治的影响	185
第二节	“大一统”与汉王朝统一	194
第三节	“天人感应”与汉代政治	201
第四节	公羊学的世袭化和儒宗地主的产生	206
第五节	公羊学教化思想与汉代政治	210
第三章	公羊学与汉代法律	217
第一节	公羊家的法律思想	218
第二节	“《春秋》决狱”与汉代政治案件	221
第三节	“《春秋》决狱”对汉代法律的影响	226
第四节	公羊学与汉代决狱时间	229
第五节	“《春秋》决狱”的社会意义	232
第四章	公羊学与汉代民族关系	234
第五章	公羊学与汉代经济	244
第一节	重农思想与汉代经济	244
第二节	公羊学救荒理论与汉代救荒措施	246
第六章	公羊学与汉代社会风气	252
第一节	公羊学“大复仇”理论对汉代社会风气的影响	253
第二节	汉画像中的“复仇”图像	257
第三节	汉代有识之士对复仇风气的批判	261
第四节	大复仇理论的社会意义	264
第七章	公羊学与汉代政治史观	269
第八章	“质文说”与汉代文家特质	283
主要参考文献		293
附 录	公羊学在汉代的师传系统	295
后 记		297

上编 公羊学学术精论

先秦儒学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在先秦诸子中占据非常重要地位。熊十力曾说：“中国学术导源鸿古，至春秋时代，孔子集众圣之大成，巍然为儒学定宏基。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百家蜂起，如十日曜天，九州布地，繁赜极矣！而儒学实为正统派，乃任异部争鸣无息，旁行不离，如太阳居中，八纬外绕也，皇矣大哉！可以观宇宙之广博无穷也。”^① 公羊学是产生于西汉前期的学术思想体系，与先秦儒学有着密不可分的传承关系，它继承了先秦儒学的思想精华，又在先秦儒学的基础上注入了新的时代特色。公羊学是齐鲁文化的结晶，在汉代公羊学被称为齐学，其实它和鲁学并没有天壤之别，它本身便带有浓重的鲁学成分，是齐学、鲁学相结合的产物。公羊学与先秦儒学及齐鲁文化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丰富的理论来源决定了公羊学深厚的思想内涵。公羊学对汉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影响如此深远，和它丰富的理论来源分不开。

第一章《春秋》三传及其区别

《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合称为《春秋》三传，它们都是解释《春秋》这部经典的书籍。《春秋》三传在汉代影响都比较大，很有必要对三者的主要区别进行探讨，以期寻找出它们在汉代势力消长的深层原因。

^①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熊十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122页。

第一节 《春秋》是一部政治哲理书

《春秋》一书，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远非其他任何书籍可比。我国古代的一些综合性图书，像《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都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经部列在四部之首，而《春秋》又列在经部之首，可见《春秋》的重要性。《春秋》原为鲁国编年体史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春秋》称为经书始于《庄子》，据《庄子·天运》记载：“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①这是六经皆为孔子手订的最早记载。因《乐经》在汉代不传，所以汉武帝时只有《诗》、《书》、《礼》、《易》、《春秋》被立为博士。五经经过孔子的手订，已和原来意义相去甚远，被分别注入了新的思想内涵。“说天者莫辨乎《易》，说事者莫辨乎《书》，说体者莫辨乎《礼》，说志者莫辨乎《诗》，说理者莫辨乎《春秋》。”^②扬雄以精辟的论断概括了五经各自的特点，以后学者对五经的评价也基本如此。五经中孔子最注重的是《春秋》，据《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记载，孔子曾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也就是说，孔子认为《春秋》是评价他政治主张的主要依据。《春秋》是否为孔子手订，历代评鹭不一，不过持肯定态度的还是占大多数。最早抬高《春秋》和孔子地位的是《孟子》。《孟子·滕文公下》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这就道出了孔子作《春秋》的

① 《庄子·天运》，中华书局，2006，第95页。

② 扬雄：《法言·寡见》，中华书局，1996，第215页。

历史背景和目的，正是在世道衰微、社会动荡、伦理丧失的情况下，孔子站在批判社会现实、拯救社会危机的立场上，通过对《春秋》史实的褒贬，来达到惊世骇俗的目的。汉代人普遍支持孟子的说法，认为孔子不仅手订《春秋》，而且其目的是为汉代改制立法，这就充分抬高了孔子及《春秋》的地位。欧阳修曾说：“孔子何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此《春秋》之所以作也。”^①清代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也认为：“《春秋》自孔子加笔削褒贬，为后王立法，而后《春秋》不仅为记事之书。”这些都是后世学者对汉人观点的理论总结。孔子通过对《春秋》笔削褒贬，“以明大义于天下”，^②这就使《春秋》不再单纯是一部史书，而成为一部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重要地位的哲理书。

第二节 《春秋》三传的主要区别

孔子后学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春秋》一经进行解释，解经之书称为“传”。《春秋》原有五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夹氏传》。因后两种已失传，所以人们通常把《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称为“《春秋》三传”。如果没有《春秋》三传，单翻开《春秋》这部书，我们很难理解相关史料及其含义，它只以非常简略的字句记载了春秋历史事件，王安石称它为“断烂朝报”，虽有离经叛道之嫌，但也十分形象。读《春秋》离不开三传，只有依靠三传，才能深刻理解《春秋》之义。

皮锡瑞曾对三传作了精彩论断：“《春秋》有大义，有微言，大义

① [宋] 欧阳修：《居士集·卷18·〈春秋论〉》。

② [元] 程端学：《三传辨疑·卷十一》。



在诛乱臣贼子，微言在为后王立法。惟《公羊》兼传大义微言，《谷梁》不传微言，但传大义。《左氏》并不传义，特以记事详赡，有可以证《春秋》之义者，故三传并行不废。”^①皮锡瑞这一论断非常公允，揭示了《春秋》三传的主要特点和区别。

一、《公羊传》、《谷梁传》与《左传》的主要区别

《左传》相传为鲁君子左丘明所作，西汉时发现于墙壁之中。因其用秦汉以前的古字篆写而成，所以称为古文经学。《左传》详细记载了《春秋》所涉及的历史史实，只在叙事后简单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左传》属于史书范畴，所以有“《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之说。《谷梁传》传说为鲁人谷梁赤所撰，经口说流传，到汉初才成书。《公羊传》、《谷梁传》都以解释《春秋》义理为己任，属于“经传”体例。两者往往就经文逐字逐句进行解释，采取问答形式，层层递进，充分阐释《春秋》经义。从以上可以看出，三传在对《春秋》经文进行阐发时所立足的角度不同。《左传》以阐述《春秋》历史史实为主，是一部史学巨著，而《公羊传》、《谷梁传》则重“义理”，是两部政治哲理书。

《春秋》三传都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它们都具有儒学的基本思想内涵。但作为三种学派，它们之间确也存在一些区别。因本文以公羊学为主要研究对象，所以我们重点对《左传》与《公羊传》、《谷梁传》与《公羊传》之间的区别进行探讨。

《左传》与《公羊传》主要差异为：

（一）《左传》以阐述历史史实为解经的主要方式，而《公羊传》

^① [清]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中华书局，1995，第19页。

以解释义理为主。

《左传》对《春秋》的历史史实进行了解释，对事件的来龙去脉讲得非常详尽，保存了大量珍贵历史史料。而《公羊传》则属于哲学范畴，它对历史史实不太注重，而是对《春秋》的义理加以阐释，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遗产。

《左传》对事件进行分析时比《公羊传》要理智一些，它更尊重客观结果，而《公羊传》则从事件的含义入手进行分析。《春秋》止于鲁哀公十四年，而《左传》延长到鲁悼公四年，它完全是为了叙述历史事件完整性的需要。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左传》只淡然记载道：“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这完全是在叙述一件事情，而没有任何渲染的成分在里面。但《公羊传》却正好相反，它认为《春秋》止于哀公十四年是有特殊含义的，“西狩获麟”是意义非凡的一件大事：“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则微者也。曷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为大之？为获麟大之也。曷为为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未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公羊传》把“西狩获麟”的意义发挥到极致，认为这是孔子受天命作《春秋》为后世改制立法的受命之符，《春秋》止于此是有非常深刻含义的，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从以上看，《左传》确实以史实为释经



的主要内容，而《公羊传》则是从事件所蕴涵的意义出发来释经。

(二) 在历史观上，《左传》和《公羊传》存在较大区别。

《左传》已产生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①的历史哲学，这一思想可能直接继承于周的“天命靡常”历史观。《公羊传》在历史观上要超越《左传》，它已产生了“三世说”。《公羊传》把春秋这段历史分为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三个阶段，认为春秋时期是按照这三个阶段向前发展的。《公羊传》不仅为春秋这段历史划分了阶段，更重要的是，它认为《春秋》是孔子托事明义之书，所以在文法上，这三个阶段并不代表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真实状况是越到后世越乱，而在《春秋》这部书中，三世因寄托了孔子的理想，所以出现了世越乱而文越治的局面。也就是说，《公羊传》认为，到了所见世，人类社会便发展到最高阶段，进入最完美的世界。《公羊传》的历史观是发展的、进步的，它比《左传》的历史观在理论水平上为高。

(三) 在思想内涵上，《左传》更注重君臣、父子之间的伦理关系。

汉章帝令贾逵罗列出《左传》在大义方面优于其他两传的地方，贾逵上书曰：“臣谨摘出《左氏》三十七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于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其相殊绝，固以甚远，而冤抑积久，莫肯分明。”^②“《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是两者在思想内涵方面的重要区别。《左传》比《公羊传》更注重君臣、父子之间的伦理关系，而《公羊传》试图用“天人感应”思想限制王权，这或许是它“多任于权变”的表现。

^①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中华书局，2000，第1520页。

^② 《后汉书·贾逵传》，中华书局，1996，第1236页。

（四）在记载典章、礼乐等文化遗产方面，《左传》要比《公羊传》为优。

在《左传》中，记载了大量典章、礼乐等文化遗产，为后世研究先秦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盖左氏之书详于典制，三代之文章礼乐犹可以考见其大凡，其远胜公谷实在于此。”^①《左传》在对文化遗产的记载方面，要比《公羊传》更有价值。

《公羊》与《左传》的优劣，是自汉代以来学术界争论的焦点。特别是唐宋时期，学者们对《春秋》三传优劣问题争论更为激烈。刘知几对《左传》情有独钟，他认为：“观左氏之书，为传之最，而时经汉、魏，竟不列于学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传。夫以丘明躬为鲁史，受经仲尼，语世则并生，论才则同耻。彼二家者，师孔氏之弟子，预达者之门人，才识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传说，比兹亲受者乎！加以二传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妄述；卖饼、太官，诚智士之明鉴也。”^②刘知几认为三传中《左传》最得孔子真谛，而其他二传则不可同日而语。刘知几可以说代表了一种思想潮流，他们不欣赏只讲义理的公羊学，而从史的角度对《左传》进行褒扬，从而得出《左传》最优的结论。清代朱彝尊亦曰：“桓谭曰：左氏传世后百余年，鲁谷梁亦为春秋传，多所遗失。又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弥离其本事矣。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③公允评价，在《春秋》三传中，在史的论述上《左传》是最为优秀的，而在义理方面，《左传》要逊色于《公羊传》。

① 《春秋左传要义·提要》。

② [唐] 刘知几：《史通·卷七·〈鉴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第148页。

③ [清] 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六十九》。



二、《公羊传》与《谷梁传》的主要区别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以《春秋》属商，以《孝经》属参。”^① 商即子夏。大概子夏在对《春秋》的理解上要比其他弟子悟性高，因此得到孔子的特别青睐。汉代公羊学家和谷梁学家，都把他们的学统的传播世系归宗于子夏。对于这一点，很多学者提出质疑。如宋代的孙觉曰：“习公谷者又言孔子经成，独传子夏，公羊高、谷梁赤皆子夏门人。若二子同出子夏之门，不应传有同异，此亦党公谷之言也。”^② 公羊、谷梁皆出子夏有一定可能性。大概齐人公羊子和鲁人谷梁子起初都受教于子夏，在对《春秋》的理解上，他们分别加入了本国的文化特色，于是形成了《春秋》学中的齐学和鲁学。尽管公羊学与谷梁学存在着诸多不同，但因两者同宗于子夏，其中必有更多相同之处。两者都传《春秋》的大义，它们都是以孔子所创儒学为宗。

《公羊传》与《谷梁传》都是从义理方面来解释《春秋》，但两者在阐述“微言大义”方面还是存在着诸多差别，两者的差别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公羊传》善变通，而《谷梁传》却不知更化。

《公羊传》对历史和现实采取批判态度，并在批判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公羊传》并不拘泥于周礼教条，它褒扬随机应变，它的一大特色便是善于变通、积极进取。公羊学的变通精神主要表现在“经权说”、“受命改制”、“张三世”等理论之中，这在以后章节将会详及。《谷梁传》相对于《公羊传》则顽固保守得多。《谷梁传》维护西周宗法制度，以宗法伦理作为评价事物的依据，所以《谷梁传》只有

① [唐] 欧阳询：《艺文类聚·人部》。

② [宋] 孙觉：《春秋经解·卷一》。